



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理的嬗变与开新*

□ 龚蛟腾 朱潇娜

摘要 中华传统文化孕育了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其实质就是以治书治学为学术核心、以释道明道为价值取向、以教化育人为社会功用的古代图书馆学。学术传承与西学东渐的综合作用震荡着校雠学的学科根基,开启了中西兼收、稽古振今的近代图书馆学发展路向,最终确定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全新范式,即以“求知”为根本的学科遵循,以“机构”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以“致用”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以“育人”为目标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 校雠学 目录学 图书馆学 转型 创新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3.022

1 引言

前期研究表明:古代有图书馆,也有图书馆学^[1]!中国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学科范式必然是不同的,这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理嬗变之因,其开新之果则形成于两种学科范式的角逐与交融中。中西图书馆学学科范式虽有不同,但皆以文献整理为基础。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源远流长,殷商时期初见雏形,春秋战国进一步发展,汉代向歆之《别录》《七略》将其推至高潮,后经学人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成熟的理论体系,古人称之为“校雠学(目录学)”。前期著作通过剖析古代校雠学之实质、梳理校雠学之源流、阐述校雠学之体系,提出“我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被称为校雠学”^[2],简言之,古代校雠学即为古代图书馆学。近代社会转型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环境与社会需求,古代校雠学因无法满足时代发展而走上西化的道路,于是在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下,“古代校雠学”之名称、学术范式、学术价值逐渐向“近代图书馆学”演变,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便在中西图书馆学的较量中形成。我们从传统文化环境入手梳理古代校雠学的学理特性,从文化转型与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寻找校雠学嬗变的原因、过程及理路,从而明晰近代图书馆学为何新、新在哪。探索中国图书馆学学理嬗变议题,不仅需要

借助古代学术范式重新认识近代图书馆学,还需要借助近代学科范式挖掘古代校雠学的现代价值,从而为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提供多元化思路。

2 文脉绵延奠定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根基

2.1 求善文化:校雠学的成学基础

不同的文化环境孕育不同的学术范式,中国古代以“求善”为根本的文化环境为独一无二的传统校雠学提供了前提条件。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官学下移,诸子学说兴起。《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3](46-47)]此言意为诸子学实为周室典制之支流余裔。其中,儒家学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3](46)]最得王官之“道”。而后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儒学亦成为天下之学术。传统校雠学之研究内容与价值取向皆以儒家学说为准则。儒学会通六艺,以六艺之道教书育人,《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4]。”《大学》是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著作,朱熹为其作序,言明古代大学所教者“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5]。可见古代教

2021年第3期

大学图书馆学报

* 湖南省“双一流”重点项目“中国图书馆事业现代化的变革与发展研究”(编号:20A494)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龚蛟腾,ORCID:0000-0001-7765-2822,邮箱:jtgong2005@163.com。



人之学或六艺之学,是圣人于天地万物俯察间所得之心得,教人以修身养性之法,所以传统校雠学的治学对象不是单纯的客观知识,而是神圣、崇高、庄严且带有主观感受的圣人之道,故此传统校雠学在治书、治学之外,还有“释道”“明道”的本体论内涵。对于圣人的理解,儒家也有解释,他们认为圣人是能够保全上天赋予仁、义、礼、智之本性的人,需要担负起教化众人、恢复人之本性的重任,即“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5](4)},所以圣人之言为义方之训、纲吉人伦。儒家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5](7)}的境界,则是对圣人之道的最终诠释,也是传统校雠学育人价值的终极目标。总的来说,古代臻于至善境界之圣人,通过仰观俯察之法,以其所得之顿悟,言传身教、著书立说,教人回归善之本性,从而构成“求善”的文化环境。求善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古代学者学的是圣人之道,求的是内圣外王,用的是修身养性之法。这与当今知识时代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讲:“如人是圣人,即毫无知识亦是圣人;如人是恶人,即有无限之知识,亦是恶人^[6]。”不同的文化环境创造不同的文化成果,中国古代以“求善”为根本的学术传统,必然赋予传统校雠学特有的学术旨趣、学术思想、研究内容等,这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成学基础,也是古今图书馆学差异之根源、取长补短之所在。

2.2 治书治学:校雠学的学术核心

中国古代虽无“图书馆”“图书馆学”之名,却有专门管理文献的藏书处所,并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图书整理活动。理论来源于实践,有治书之实,便有治书之名,程千帆言:“治书之学,旧号校雠^[7]。”校雠之名,最早见于刘向之《别录》,即“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7]。”《七录》将校雠定义为文字校勘,然向歆校书活动,绝非仅有文字考订。章学诚之《校雠通义》开篇重申向歆之校雠学本义:“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渊流^①,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8](序)}。”可见在章学诚的认知中,校雠学已不单单是治书之学,而是上升到学术层面上的治学之学,其研究对象侧重于文献所载之学术以及学术背后的“道”,这是以“求善”为根本的学术传统赋予校雠学的特殊价值。张尔田认为,孙德谦所著《刘向校雠学纂微》可概括

刘向校雠学的内容,具体包括: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条篇目、定书名、谨篇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究得失、撮指意、撰叙录、述疑似、准经义、征史传、辟旧说、增轶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9]。经后人补充,校雠学逐渐发展为以学术为核心,集治馆、治书、治学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其中,治书与治学为校雠学之核心,两者形影相随,“没有脱离‘治书’的‘治学’,也没有躲避‘治学’的‘治书’”^[10]。治书与治学虽紧密相联,但也存有根本性差异,治书侧重于书之版本、完缺、形式、典藏等,治学侧重于对内容的求真、评析、揭示,是对学术的再一次升华。治学由求真、解题、编目组成,其中,求真是通过校勘活动,恢复文献本来面目,是治书之主体,也是治学之前提;解题一般由博学之通儒通过知人论世的方法,考究文献所载学术之源流、道义、是非,进而揭示文献所载之圣道,是治学、释道的重点内容,这也是古代校雠学者多为历朝名士的缘故;编目则是根据文献所载之学术内容、价值内涵以及体裁形式进行归类,以分类编目的方法梳理学术源流、规范学术秩序,使天下文献有类可依,读书治学有章可循,实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1]的治学理想,是校雠学的最后一步,也是治学的新开始。可以说,古人读书治学必得有校雠,校雠之过程就是治学之过程,两者相依相偎难分彼此。

2.3 释道明道:校雠学的价值取向

以“释道”为旨归的价值取向,是校雠学在“求善”文化背景中的必然走向以及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回音。可以说,校雠学因“释道”而生,因“明道”而成。向歆之校雠学,最为推见古人大体,章学诚在《原道》篇指出:“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8](3)}。”周室衰微,官学下移,私门著书立说,周室之典章四散,需要校雠学担负起辨章学术、追溯六艺源头、恢复三代以上文化秩序的释道责任。校雠学释道明道之旨归,表现在文献整理的方方面面,傅荣贤先生认为:“以《七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书目的文献秩序源自对‘道’的模拟^[12]。”换句话说,古代书目并不是严格按照文献知识内涵分门部类,而是按照天地阴阳及文献所载之“道”确定文献在类表中的位置。孙德谦所言之“准

① 注:此处“渊”应为“源”。



经义”正是对人伦纲常的显性回应：“向之校讎也，《六艺》一略，冠于其前，已使人知经教之当崇法矣^{[9](32)}。”除分类外，文献之删改、提要之纂写、道器之关系、源流之考辨等皆担负着旌别兼施、褒越私昭之责任，如《四库全书》的文献收录必须“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13]；提要之纂写须知人论世，即考察作者生平行事与道德品行，品评文献之价值，追寻文献所载之“道”；书籍之排列，必须道器相从，即器明道；考辨学术源流，实为追寻“道”之源头，辨别离道之学术。因此，校讎学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的学术价值，最终还是指向了“明道”的本体内涵。总的来说，校讎学以“释道明道”为旨归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古代“政教一体”“内圣外王”的文化环境赋予的责任与天命。以今律古，古代图书馆学的“释道明道”取向似乎弊大于利，但不能否认，中华文化及典籍正是在传统校讎学的保驾护航下流传千古，绵延至今。

2.4 教化育人：校讎学的社会功用

传统校讎学集治书、治学、释道、明道于一体，除了具有保存藏书、培育人才、资政参考、纂修著述等功用外，还有教化民众的作用。《谭津文集》对教化的解释为：“礼义者，教之所存也；习尚者，化之所效也^[14]。”教化，分为教与化，教即教育，古代多指统治者以礼义教育民众；化，有感化之意，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德治国，使民众从内心顺服。而教化之资，则为上文提到的“圣人之道”，如儒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常，将“圣人之道”教于民众，并且以身作则，在民众中形成一种风俗，便是教化。中国传统文献本身便有大弘文教的价值取向，如《隋书·经籍志》言：“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15]。”中国传统学术“政教不分、官师一体”的特性决定了以“治学”“释道”为追求的传统校讎学，必然有着教化民众的功用。可以说，传统校讎学如何治学，便如何育人；如何“明道”，便如何教化民众。譬如，传统校讎学通过对文献的筛选、校勘、解题、编目等活动，辨别文献是非，揭示文献所载之道，进而敦崇风教，强化文献在政教上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培养圣贤、引导社会风尚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如孔子回答子奚关于“为政”一事，其言：“《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6]？”孔子认为，他平日里孝敬父母，

关爱兄弟，以身作则，引导社会风俗，使民众追随圣贤之道，以此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便是“为政”。传统校讎学集“治书、治学、释道、明道”于一体的特殊性以及古代政教合一的政治环境，使其产生了社会教化的功用，这就意味着传统校讎学的社会价值从个人修身提高到了治国的层面，进而与儒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相契合。

3 西学东渐改变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路向

3.1 批判传统文化动摇学术内核

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环境与学术内容，赋予古代图书馆学特有的理论体系与价值内涵。政教合一的封建文化、重道轻器的学术传统以及内圣外王的求学目的无一不给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留下专属烙印。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古代图书馆学。但清末民初的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引发了对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极大地动摇了古代图书馆学的基础内核。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的批判，重点在学术背后的“至圣”光环与政教合一的封建模式，其目的是剥离传统学术对政治的高度依附性，结束三纲五常对人的精神桎梏，如致力于古史研究的顾颉刚先生说：“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17]。”中国学术环境由政教向文教转型最大程度上弱化了古代图书馆学于教化上的社会功用，这一转变不仅为图书馆学的专业化发展作了铺垫，也保证了图书馆学专于“治书”的纯粹性与高效性；对“经典”“圣人”的批判与还原则使古代图书馆学的“释道明道”价值备受诟病，图书馆学关注的不再是人之本性与修养，而是人之学识与能力；社会形势对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打破了古代图书馆学“重道轻器”的治学准则，晚清第一部“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在经世实学思想的影响下，不再以“重道轻器”为治书准则，而是考虑“足备经济、有关治世”^[18]的实用标准。与批判传统学术相伴的，是对西方文化的逐步接受与日益推崇。西方文化尤其是欧美学科理念及方法的传入对传统学术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中国的学术范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说批判传统学术对古代图书馆学造成根本性的破坏，那么西学的引进则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新生提供了契机，新的学术环境对图书馆学而言，不仅是新要求，也是新路向，若用“重



道轻器”一词来简单概括古代图书馆学,那么“重器轻道”则是其新的发展方向。

3.2 变革思维方式更新学科认知

近代学人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多有思考,梁漱溟先生回顾前人之说,从不同民族的生活意欲出发找到了较为精准的答案,其言:“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的色采,与我们截然两样,就是所谓‘科学的精神’^[19](39)]。”这里的科学精神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治学方法,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缺少科学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严复曾以“宗经征圣、求诸方寸、短于逻辑”^[20]概括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宗经征圣”是指古人著书立言必须以“经典”“圣言”为法则,其思其言皆来源于“圣典”,倘若脱离经圣的学术范围,便是大逆不道的乖僻邪说。于是,中华文化虽有千年历史,却始终没有跳出儒学的框架,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虽历史久远,走的始终是“重道轻器”的路子。可以说,“宗经征圣”的思维方式预示了古代图书馆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申明大道”内容旨趣的必然性;求诸方寸则是古代中国人典型的思维方式,也是导致中西治学方法与学术环境截然不同的根本所在,具体表现为整体性思维方式与直觉体悟的治学方法,即“在终极意义上或整体意义上把握事物的本原及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其特征是不分主客的整体直觉或直观把握,以此区别于主客二分的分析性思维”^[21],所以中国人很少能以主观之“我”去研究客观之“非我”的问题,多是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从自然万物中顿悟“修身之道”,于是中国古代多“道学”少“知识”。与之相对的,西方早已将“我”与“非我”区分开来,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到独立于“我”之外的专门之学,属于逻辑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方式对应应在治学方法上,便是严复所言的“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22]。”,即观察——总结规律——验证,循环往复以求出更为精确、公认的科学公例。思维方式的变革给国人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角、研究学问的新方法,中国图书馆学开始区分“主我”与“客我”,“主体人就可以站在文献的对立面,从逻辑和学科属性的角度控制、度量乃至征服文献”^[23],且尽量避免管理者的主观感受对文献整理造成的影响。在西方思维方式的对照下,国人对传统学术的“道器”“源流”认识更为清晰,对图书馆学价值取向与社会功用也有了新的认知。

3.3 留学欧美全面引入西学模式

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固有的学术体系,思维方式的变革加快了西方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清末至民国初年,有识之士大力宣传西式图书馆学思想,政府自上而下创办公共图书馆,为全面引进西式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提供了社会条件。1917年后,以沈祖荣为代表的第一批留学欧美的图书馆学人陆续回国,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构建近代图书馆学模式的路程。首先是通过文献编译,将大量的著作、论文介绍到国内,使国人对新式图书馆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1923年,杨昭哲先生的《图书馆学》立足本国国情选择性借鉴西式学理,实现理论与应用的系统结合,通常被视为“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24]。《图书馆学》一改往日译书风潮,采取编译结合的方式在当时产生较大的影响,之后的学者在介绍西方图书馆学时,发挥己见,逐步建立起立足于西学模式的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据吴稼年先生统计:“在1924年至1936年期间,翻译的论文有294篇,著作29部”^[25]。”其次,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保证中国图书馆学的长久发展。1913年,克乃文在金陵大学设置图书馆学课程。1920年,韦棣华在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这是我国出现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而后,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留学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三大类型的图书馆教育体系,为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最后是打造专业学术环境,确保中国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发展。沈祖荣、胡庆生、李小缘、刘国钧、戴志骞、袁同礼、杨昭哲、杜定友、洪有丰、徐燮元、李燕亭、冯祖怡、王京生是中国近代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程焕文先生称他们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奠基的一代”^[26],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图书馆学专业化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在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倡导与努力下,图书馆界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凝聚全国之力共商中国图书馆学未来发展之路;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提供学术交流的专业化平台。毫无疑问,无论是理论内容还是学科环境,近代中国图书馆学走的都是西方化的道路,但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学术环境,完全西化必然不是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正确选择。

3.4 稽古振今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到底应该怎样走的问题,在近代图书馆学转型之初便有了答案。孙毓修编译的



《图书馆》应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立足于中国国情系统介绍国外图书馆的著作,其开篇写明成书规则:“爱访密室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27]。而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引进中国的第一代图书馆学人,在其留学欧美时便认识到,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之特点,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必须符合中国国情。1921年,留学菲律宾的杜定友在其毕业论文中写道:“没有一所外国的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全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之用”^[28]。尤其是西方图书馆学在中国国土上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时,这一答案更加明晰。1925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29],肯定古代图书馆学的现代价值。古代图书馆学与近代图书馆学一脉相承的内在渊源,确保了继承传统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合理性。校雠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的方法的学科”^[30],图书馆的本身规定性是“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专门设施”^[31]。因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虽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核心理念上存在认知差异,但都是以“文献整理”为立学根本,从本质上说,两者皆是“治书之学”,只不过古代图书馆学侧重于“学”,西方图书馆学侧重于“馆”,但最终都指向了“用”。总的来说,批判传统学术引进西方图书馆学与变革思维方式更新学科认知,一个从外部施压迫使古代图书馆学必须有所舍弃,一个从内部瓦解使古代图书馆学的某些内容失去存在意义,一内一外,推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走向“重器轻道”的新路径,然而无论是从时代发展需求还是学科内部的继承性来看,稽古振今,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才是近代图书馆学发展的最好选择。

4 新旧并蓄确定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范式

4.1 以“求知”为根本的学科遵循

以“求善”为根本的文化环境与以“富强”为目标的社会需求矛盾重重,西方文化在这特殊时期趁机而入,自然科学知识与“主客二分”的逻辑思维方式反客为主,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于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治学大环境慢慢由“求善”变为“求知”。“求知”的某些特性决定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需要重新梳理理论体系确定新的发展模式。首先,传统“宗经征圣”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古代的学术体系后来之创见不如三代之圣典;西方逻辑思维作用下的自然

科学知识是慢慢前进的,并作用于社会生产力之发展。于是,以“求善”为学科基础的古代图书馆学重典藏,注重对学术源流的梳理与圣道的阐释,以“求知”为学科基础的近代图书馆学侧重于利用,考虑的是如何迅速、快捷地将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古今图书馆学的不同追求决定了学科的价值取向、发展形式、社会责任的不同。其次,以“求知”为根本的学术环境决定了文献所载内容由“主观圣道”变为“客观知识”,文献不再是“道”的载体,学者获取学问的方式由顿悟、交流变为直接读取,图书馆学人不需要关注著者之思想、圣道之阐释以及学者之修身,只需要保证文献的利用率,于是图书馆学社会价值的实现跨过“释道”直接迈向“致用”,古今图书馆学人需要具备的学科能力与知识储备也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差别。最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在科学精神与治学方法的作用下产生的以研究对象为标准的专门之学,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西方人走上了科学的道,便事事都成了科学的”^{[19][34]}。”这也是西方分科观念产生的思想渊源。于是在事事为科学的文化背景下,国人将分科理念引入图书馆学中,不仅改变了图书分类标准,还以此研究传统校雠学。最终在分科治学的引导下,校雠学由会通之学裂分为以研究对象为标准的图书馆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典藏学等专门学科,成为传统校雠学向近代图书馆学演变的重要标志。

4.2 以“机构”为核心的学科体系

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构建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作了充分准备。中国近代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回归则将体系构建提上日程,他们以专业的图书馆学知识与深厚的国学基础,立足于中国国情逐步构建出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杨昭哲的《图书馆学》一书意味着中国“已大致确立了图书馆学的研究体系”^[32]。随后,杜定友、刘国钧、洪有丰、马宗荣、沈学植、俞爽迷、徐家麟等学者发表的系列文献,逐渐确立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首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由“学术”转向“图书馆”,如杨昭哲引用《马叶氏百科全书》对图书馆学的定义:“(图书馆学)是把关于图书馆的理论,和技术知识的,总和为有系统的研究”^[33]。”刘国钧、杜定友、洪有丰等学者也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为图书馆,虽然部分学者在思考图书馆学的科学性问题时将研究对象转移到人类知识



上,但这种认识是基于图书馆对人类知识的作用产生的,从根本上看研究对象依旧是图书馆;其次是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机构”为中心,如刘国钧先生根据图书馆“四要素说”构建理论体系,直接以图书馆的构成要素作为理论建设的分支,“更贴近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实际,更具学术性、科学性”^[34];相关著述大多围绕着图书馆学理论构建、图书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图书馆管理与经营、图书馆类型以及图书馆的社会价值等内容展开。综上,中国图书馆学由以“图书”为研究对象的集治书、治学、治馆于一体的释道体系开始向以“机构”为研究对象的治馆之学转变,治书成为图书馆经营中的一部分,治学的内容则被大大敛缩,两者皆成为治馆下的分支内容,而“释道明道”的价值内涵则因祛魅销声匿迹,由此可见,以“机构”为核心的近代图书馆学将学科研究范围限定在一馆之内,大大敛缩了图书馆学的社会价值。因此有学者称:“表面上,晚清以来中国人文主义的目录学为西方形式主义的目录学所取代、中国整体型图书馆管理思想为西方分析型管理理念所取代等都是具体技术的‘转向’,实质上却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深层本体论的丧失^[35]。”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近代化发展,在追求科学化、专业化、高效化的同时,忽视了本土校雠学的核心价值,幸运的是,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目录学、典藏学等有关文献整理的内容皆在图书馆学的庇护下得以发展。

4.3 以“致用”为旨归的价值取向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以杜威经验哲学为代表的图书馆学理论成为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36],技术层面的图书馆实际工作成为学界关注的主要内容,这一倾向同样影响到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走向。如何管理图书馆确保读者高效、便捷地找到所需书籍,成为近代图书馆事业与学科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意味着以“释道”为旨归的价值取向开始向“致用”转变。1921年戴志骞先生在北京高师作了一次有关图书馆学的演讲^[37],在谈及建设实用图书馆时,从图书馆选址、馆舍环境、购书类型、图书分类、借阅时间以及公开平等的服务理念六个方面作了提示,分别对应图书馆利用之便利、舒适、实用、效率、时限以及实际性。刘国钧先生则将“自动、社会化、平民化”^[38]总结为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一一对应“致用”取向,如自动之性质,即图书馆“致用”之积极、主动的倾向;社会化之性质,即“致用”服务对象

的社会化;平民化之性质则是致用之资的平民化。近代图书分类也开始向“致用”转变,西方以哲学上的知识分类作为分类依据,单个文献在分类体系中没有必须的关系,不需要考虑“释道”“源流考辨”的内容,所以西方的图书分类可以只考虑“实用”的方法以及如何做到极致,为此吴稼年先生认为西方的图书分类走的是“内容划分、藏书为本”的“实用”学术范式^[39]。近代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研究,皆要在“致用”的范畴内大显身手。但古代图书馆学以“释道”为旨归的价值取向并非不重利用,在“天人合一”“政教一体”的文化环境下,图书馆学之“致用”取向需以“释道”为前提,这就导致其致用方式、服务范围、服务理念、社会功用显得不那么直截了当。

4.4 以“育人”为目标的社会价值

无论是古代校雠学还是近代图书馆学,皆有“育人”的社会价值,只不过古代校雠学之“育人”既可通过校雠学本身的治书、治学、释道的能力实现,也可通过藏书楼的“藏秘书、处贤才”^[40]的治馆价值实现。近代学术环境与社会需求的转变,使得图书馆学的“育人”价值更多依托于“图书馆”这一机构之上,藏书楼“处贤才”的传统得以继承发展,其服务范围从学者精英扩大到普通民众,从理论上真正实现无差别的育人理想。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始至终伴随着“启迪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培育新式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是近代图书馆的首要目标也是最终理想,如维新人士所言:“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41]。”他们认为书籍馆(图书馆)与学校、新闻报馆一样,是培育人才、振兴国家不可或缺的社会机构,于是大力倡导创办学堂学会藏书楼以供民众之用,从而成为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声。而后,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开展新式教育、维护封建统治,自上而下倡导建立公共图书馆,虽其公共性程度不高,但也是为育人而设。民国时期为普及平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专门设立面向社会大众的通俗图书馆。我们认为,“通俗图书馆收集浅易图书、新闻杂志,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在普及知识、启迪民众、教育国民和传播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2]。由此可见,近代图书馆之设立,无一不抱有培育人才、启迪民智的社会理想。于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近代图书馆学,其育人价值便通过“治馆”来实现,即研究



采集什么类型、什么水平的图书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如何整理、管理图书保证读者迅速、准确地获取,如何提供整洁、舒适的馆内环境为读者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等内容,且近代图书馆学的“致用”旨归,最终皆指向育人的社会价值。可见,近代图书馆学的“育人价值”更多依赖于治馆的实现,传统校雠学在治学与明道上的育人功用被大大忽视,这是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发展的特质——进步与不足相互交织。

5 结语

学术环境的内在变革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外在影响使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发生嬗变,并逐渐开辟出符合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新路子。近代学人虽极力倡导要以中西兼收、古今并蓄的方式创建中国的图书馆学,但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与时代变革的助推下,中国的图书馆学还是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甚至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中心论”愈演愈烈,“中国古代无图书馆学”的言论甚嚣尘上,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典藏学等古代图书馆学的重要组成逐渐淡出图书馆学领域。从“实现文献价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和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具有相通的学理、旨趣与功用。易凌等通过梳理近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从更深的理论层次重新定义图书馆学,认为“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图书馆使文献服务于读者、实现文献的知识价值^[43]。”与之相应的,古代图书馆学则是研究如何通过“治学”服务于国家与个人、实现文献的“知识价值”与“精神价值”。两者相较,近代图书馆学将力量作用在图书馆上,发力者为具备基本图书馆管理能力与技术的馆员,实现途径是读者对文献的高效获取。古代图书馆学则将力量直接作用在学术上,发力者为学识渊博的名流学家,实现途径是以学术通儒之隐性知识及道德修养为基础对学术内容的整理与揭示。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与图书馆学科服务、知识服务的发展,似乎与古代图书馆学的治学内容不谋而合。因此,中国图书馆学未来之发展,应重新审视古代图书馆学的发展路向与学术价值,从中汲取有益部分构建真正的中国图书馆学,为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贡献国人智慧。

参考文献

- 1 龚蛟腾.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与秉承.大学图书馆学报[J],2011,29(3):91-98.
- 2 龚蛟腾.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分析——从古代校雠学说向西式图书馆学[J].图书与情报,2014(1):41-53.
- 3 班固.汉书[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
- 4 庄子.庄子[M].曹础基,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427.
- 5 孔丘.四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 7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8:叙录1.
- 8 章实斋.校雠通义[M].罗经,标点.上海:大中华书局,1934.
- 9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M].苏州:四益堂,1923.
- 10 龚蛟腾,方雯灿,易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重新审视[J].图书馆学研究,2018(15):2-8.
- 11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
- 12 傅荣贤.古代书目中的秩序:文献、人伦和天道[J].图书馆杂志,2013,32(12):18-22,36.
- 13 任松如.传统文化修养丛书:四库全书答问[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204.
- 14 契嵩.镡津文集[M].钟东,江绘,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5.
- 15 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
- 16 孔子.论语[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3.
- 17 顾颉刚.我与古史辨 走向大学问家的思想深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15.
- 18 黄长义.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J].江汉论坛,2005(12):86-92.
- 1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0 胡文生.学术·体制·人——晚清学术转型的多维透视[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5:13.
- 21 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特征[J].图书馆论坛,2020,40(2):26-35,44.
- 22 赫胥黎,约翰·穆勒.天演论 论自由[M].严复,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47.
- 23 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4.
- 24 龚蛟腾.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从校雠学说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变[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29.
- 25 吴稼年.论“新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期[J].图书馆,2007(2):6-9,16.
- 26 程焕文.论图书馆人才特征——关于“图书馆四代人”的探讨[J].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3):22-29.
- 27 孙毓修.图书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4.
- 28 王子舟,廖祖煌.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初探[J].图书情报工作,2002(1):22-28.
- 29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11-15.
- 30 崔军红,刘云霞,毛建军.实用古典文献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334.



- 31 蒋永福,孙德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三题[J].图书馆建设,2018(4):112-116.
- 32 顾焯青,吴稼年,刘宇.从学科认同的构建看“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立[J].图书馆杂志,2012,31(3):2-7.
- 33 杨昭慈.图书馆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9.
- 34 黄宗忠.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J].图书与情报,2003(3):2-9,54.
- 35 李明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取向——从文献学路径获得的认知[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36(1):27-34.
- 36 曾凡菊.芝加哥学派对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影响探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6(9):2-6,33.
- 37 戴志骞.图书馆学术讲稿[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42-43.
- 38 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J].金陵光,1922,12(2):22-24.
- 39 吴稼年.文献分类与学术转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3):108-112.
- 40 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若干重要思想范畴解读[J].图书情报知识,2020(3):83-89,108.
- 41 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128.
- 42 龚蛟腾.清末至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勃兴与繁荣(上)[J].图书馆,2011(1):1-6.
- 43 易凌,龚蛟腾.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应然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9,39(9):19-29.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收稿日期:2021年1月23日

修回日期:2021年3月8日

(责任编辑:王波,支娟)

The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Modern China

Gong Jiaoteng Zhu Xiao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gave birth to the collation theory aiming at “distinguish academic authenticity and sort out academic sources”. Its essence is th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which takes organization of books and scholarship as the academic core, interpre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principle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as the social function. The integrated effect of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has shaken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of collation theory and opened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that combines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revitalizes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Finally, a brand-new paradigm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was determined, namely, a discipline followed on “seeking knowledge”, a discipline system centered on “institution”, a value orientation based on “application”, and a social value based on “education”.

Keywords: Collation Theory; Bibliography; Library Scienc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接第96页)

The Intelligence Enabling of Reading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Sun Peng Wang Guihai Che Baojing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ce of intelligence enabling in reading promotion an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data center, it constructs the intelligent model of reading promotion, and propel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responsibility sharing and value co-creating of promotion teams, feature rebuilding and classifying of promotion objects, promotion content focusing and matching, and the pathway innovating and cover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hoped to optimize the strategy through the goal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driving.

Keywords: Reading Promotion; Intelligence Enabling; Data Center; Value Co-creating